

笛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与英国性建构

陈栩¹ 孔令然²

(1.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2.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身体是笛福小说中循环出现且颇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意象,身体的再现构成意识形态话语,涵摄了种族、性别和民族等诸多要素。笛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不仅反映了生命个体的生存体验,亦是作者建构英国性的诗学手段。借由身体叙事,笛福塑造了英国现代公民的形象谱系:凭借勤勉自律消除身体饥饿的帝国殖民者;命运多舛、卖身为生的底层女性;疫病重创之下重建民族共同体的伦敦市民。身体叙事与笛福对英国性的审视同频共振,既有力呼应了18世纪初期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潮流,又深刻影响了后世小说家的身体书写与国族想象。

关键词:丹尼尔·笛福;身体;身份;英国

中图分类号: I074.5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4)02-0086-12

0 引言

作为英国小说的先驱,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独具匠心地将身体话语纳入文学创作,不仅在故事内容和叙事技巧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创新,而且生动记录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的社会风貌。国内外学界针对笛福小说的身体叙事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笛福笔下食人生番和家庭主妇的身体形象折射出一种复杂的人性之欲(Backscheider, 1976: 103; Flynn, 1990: 1),也有学者聚焦疾病叙事,分析身体规训、生命政治与死亡伦理之间的动态关系(Wagner, 2017: 501-517; McDowell, 2006: 87-104)。国内学界则认为,笛福基于具身经验刻画了诸多“既善且恶的冒险家的双重形象”(李维屏, 2008: 73),这些人物启发读者叩问伦理道德对世界秩序的潜在影响(黄梅, 2015: 83)。上述评论新见迭出,但学界尚未充分聚焦笛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与英国性

收稿日期: 2023-12-09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丹尼尔·笛福小说身体叙事研究”(20JK0322)、第十一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课程思政引领下的英美文学选读教学研究”(ZGWYJYJJ11A025)和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英美文学选读‘课程思政’行动研究”(21BY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栩,男,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小说和西方文论研究。

孔令然,女,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 陈栩,孔令然. 笛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与英国性建构[J]. 外国语文, 2024(2): 86-97.

(Englishness)的微妙关联。

关于“英国性”这一概念学界已有颇多论述。科利(Linda Colley)认为,英国性意识在18世纪迅速成长,它依附于都市、城镇和乡下等王国内的各种地理空间,“致力于锻造统一的政治身份”(Colley, 1992:53)。库马尔(Krishan Kumar)也认为,英国性是英国民族身份的同义词,这种具有支配性地位的身份意识形成于18世纪(Kumar, 2003:151),是“英国民族主义的有力表达”(Kumar, 2003:xi)。托德(Phillip Dodd)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英国性与民族身份密切相关,它通过对岛国文化要素的接纳、排斥或改造得以再现(Dodd, 2014:26)。在伍德(Dustin Frazier Wood)看来,英国性揭示了“一种政治和文化身份”“代表了大英帝国所有臣民的性格”(Wood, 2020:7-8)。伍氏特别强调,“英国性”的滥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18世纪各种印刷品——尤其是历史剧和通俗小说——的流行(Wood, 2020:174)。从上述争鸣可以看出:首先,英国性是对英国国民性格的典型概括,这一抽象概念通过具象的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建构得以彰显。其次,英国性建基于空间政治、形象书写和身份想象等诸多议题,这些视角从多重维度照见现代性语境下英国社会独特的情感结构。再者,小说的兴起在形塑英国性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以深刻而新颖的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Anderson, 2006:36)。

无论从上述何种意义上来讲,笛福的小说作品都是书写英国性的典型文本,诚如有评论所指出的那样,笛福小说已然跻身“当之无愧的描写英国性以及英国民族性格的作品宝库”(Kumar, 2003:19)。只不过,笛福将他对英国性的思考完美地融入身体叙事,二者相互烛照,构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由作者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想象世界”的“典型结构”(Anderson, 2006:25-26)。本文选取笛福的四部重要小说——《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 1719)、《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 1722)、《罗克珊娜》(*Roxana*, 1724)和《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作为解析对象。这些作品涵盖历险小说、女性小说和纪实小说等类型,小说人物不仅有为英帝国开疆拓土的创业英雄,也有身经磨难的底层女性以及饱受瘟疫侵袭的伦敦市民。本文以上述作品中的身体形象作为节点,对身体叙事与英国性的交互关系进行症候式解读,以期揭示现代性背景下笛福对不列颠民族身份的深刻体察与严肃思考。

1 饥饿的身体与帝国欲望

18世纪是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商人出身的笛福紧扣时代脉搏,旗帜鲜明地提出夺取海外殖民地并与落后民族扩大贸易的经济主张(郭建中,2013:83)。与之相应,笛福在小说创作中不遗余力地塑造帝国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代言者,这些新型英国人几

乎都是洋溢着男性气概的创业英雄,其中的佼佼者当推《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同名主人公鲁滨孙。在远赴几内亚贩奴的航行中,鲁滨孙遭遇沉船侥幸脱险,他这样描述自己流落荒岛后的危机状态:“我整天悲痛着我这凄凉的环境,没有食物,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武器,没有出路,没有被救的希望。”(笛福,2003:52)突如其来的海难让曾经意气风发的帝国子民沦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赤裸生命”(Agamben, 1995: 55)。然而,鲁滨孙存身的荒岛也是一个造就现代主体的特殊空间,正如有学者认为,成为现代人意味着自身处于一个充满冒险和变化的环境中,“同时又处于一个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晓的一切以及我们所是的一切的世界”(Berman, 1988: 15)。对于鲁滨孙而言,饥饿是威胁生命存在的最大之恶。小说将主人公的饥饿及其食欲的满足作为起点,逐步推动现代主体自我重塑这一核心故事情节的发生和发展。

鲁滨孙登岛后赖以生存的食物是在船上抢救的零星面包、甘蔗酒、砂糖和面粉,他亟需寻找稳固的食源以确保自己安全无虞地生存下去。笛福在《计划论》中将人与动物的生存方式进行了对比:自然界为动物准备了衣食,它们凭借本能便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然而人却必须工作才不会挨饿,必须像奴隶般的劳苦才不会死亡。的确,人天生有指导他的理性,遵循理性指导的人很少会沦入这样凄惨的绝境”(笛福,1997:78)。细查之下,笛福推崇的理性与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簿记理性如出一辙,这种思维方式激励人们将改善生存与积累财富视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他们会表现出“洞若观火的远见与行动力”(Weber, 2005:25-31)。反观小说,饥肠辘辘的鲁滨孙被赋予了践行和阐释理性的文学使命。他每天都要像“英国领主一样”(笛福,2003:74)携带枪支巡视岛屿,目的是了解岛上的物产资源,他与荒岛之间形成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以凝视为基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他者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可能的对象”(陶家俊,2008:155)。值得注意的是,鲁滨孙的记述中鲜有以欣赏的目光所摄取的异域风景,读者触目所及的都是他对物的冷静观察。在他的全景敞视之下,与世隔绝的孤岛生发出另外一重面相——岛上不仅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和烟草植物,而且盛产各色水果,如甘蔗、葡萄、柠檬、橘子、椰子等,食物的在场性使鲁滨孙成为欲望的主体。

如果说巡视岛屿是为了解决果腹问题,那么,鲁滨孙对岛屿特定空间的改造则是为了寻找栖身之所。小说中的一个经典场景是他用篱笆精心构筑的“城堡”:

我插了两排很结实的木桩,把它们打进泥土里,仿佛一些木橛子,大的一头向下,高出地面约五英尺半,顶上削得尖尖的。两排之间的距离不过六英寸。然后,我又取出我从船上截下来的那些缆索,沿着半圆形,把它们一层一层地横放在两排木桩中间……至于这地方的进出口,我并不做门,只用一只短梯从顶上翻进来,进来之后就把它收起来。这就使我四面都有了保护,完全与外界隔绝起来,因而夜间可以高枕无忧了。(笛福,2003:44)

事实上,鲁滨孙对空间的缜密规划与他的食人想象密不可分,他不仅时刻担心自己会沦为野人的腹中餐,而且对食人族充满极度的恐惧和憎恶。在他看来,同类相食是最残忍的行为,野人“比非洲的狮子和老虎还要恶劣”(笛福,2003:94),他经常隐藏在堡垒中,用望远镜眺望海面,以防未知的神秘野人突然登岛。作为话语修辞,食人主义(cannibalism)擢升为“一种结构原则”(Armstrong, 1992: 208),生食与熟食之间的差异在鲁滨孙的认知图式中转化为野蛮与进步的决然对立,这意味着蛮族身体有待驯化成文明的身体。可以说,鲁滨孙的防御工事不仅考虑了摄取食物的便利,更是他纾解食人焦虑的居间媒介。

为了凸显鲁滨孙食欲的正当性,小说转而聚焦其狩猎与垦殖行为,这种获取食物的方式让他与荒岛之间进一步形成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鲁滨孙对狩猎情有独钟,他“很少早晨不出门,并且很少不打些东西回来吃”(笛福,2003:55)。他最擅长设置陷阱来捕捉山羊,并将猎物驯养在坚固的篱笆围栏内。对于保持良好食欲的鲁滨孙而言,驯养可谓食物补给的重要保障——圈养山羊就等于替自己建立了一座羊肉和羊奶的活仓库,这让他感觉“像在英国一样”(笛福,2003:170)。除了山羊,鲁滨孙的狩猎对象还包括野鸭、野鸟、野鸽、海鳖、鱼类等,他据此总结出了一套饮食经验,比如飞禽的肉“很好吃”(笛福,2003:84)、鳖肉是“最香最美的肉类”(笛福,2003:65)。丰富的食物种类表征了鲁滨孙顽强的生存能力,彰显了理性改造世界的非凡魔力,他“用来自英国的观念和形象来理解、把握并‘降服’那片陌生的土地”(黄梅,2015:44),原本混乱无序的荒野变成一个安然有序、衣食无忧的自由王国。

不仅如此,垦殖也是鲁滨孙占有食物的另一个有效手段。在他看来,开垦土地才是“我的主要工作”(笛福,2003:104),他将船上抢救下来的大麦和稻子就地播种,来自文明世界的农作物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水稻每年可以收获两次,播种的二十斛大麦能收获二百多斛,这些谷物足足可以支撑一年的消耗。鲁滨孙还花费大量时间制作面包,他自豪地宣称“就是伦敦利登赫尔菜市场也搭配不出更好的筵席”(笛福,2003:83)。基于对生理需求的极大满足,鲁滨孙完成了现代主体的塑造,由一个孤独无助的落难者变身为自力更生的劳动者。尤为重要的是,他的强大胃口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需求形成了显著的互文关系。在小说中,被丰盈食物包围的鲁滨孙情不自禁地展开了意味深长的帝国想象:

你要是看到我和我的小家庭坐在一处用饭的情形,即使你是一个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你也不禁要微笑。我坐在那里,简直像全岛的君王。我对于我的全部臣民拥有绝对生杀之权,我可以把他们吊死,开膛破腹,给他们自由,或是剥夺他们的自由……你看我用餐的时候,俨然像一位国王,一个人高高坐在上面,臣仆们在旁边伺候着。……现在我既有足够的侍从,生活也过得很富裕。(笛福,2003:113)

鲁滨孙的餐桌“变成了民族特性的表达方式”,增进了读者对英国饮食习惯的向往和

认同(阿尔贝,2012:155)。不仅如此,消费熟食的身体既是文明的现代身体,也是建立荒岛乌托邦的基石。鲁滨孙的进食过程成为其身体改造与身份重构的重要仪式,诚如萨义德(Edward Said)所言,“如果没有在遥远异乡……创造自己新世界的殖民使命,简直就无法想象鲁滨孙·克鲁索”(Said,1993:64)。小说主人公的荒岛生存体验承载了笛福一贯强调的以理性见长的“英国人的特性”(笛福,1997:24),鲁滨孙作为大英帝国殖民者的形象由此确立。

2 身体展演与女性主体性重塑

除了在历险小说中以身体话语塑造男性拓荒者的形象,笛福在随后出版的两部女性小说《摩尔·弗兰德斯》与《罗克珊娜》中也以同样的视角对女性命运予以观照。这两部姊妹篇堪称英国底层女性生活的“微观史”:摩尔生于伦敦纽盖特监狱,幼年不幸遭人引诱失身,成年后在英格兰各地沽售姿色,最后因盗窃罪而被流放到弗吉尼亚;相比之下,罗克珊娜从法国移居到英国伦敦,在遭遇婚变后游走于欧陆各国并与众多权贵交往,终因谋害亲生女儿而受到惩罚。两部作品中或隐或现的身体意象堪称解析文本深层内涵的阿里阿涅德之线,那么,身体如何参与了女性主体性的建构?笛福又是如何通过女性身体话语来反思英国性的呢?

对于涉世未深的摩尔和她的文学姐妹罗克珊娜来说,身体是她们与当下世界建立有机链接的通道,她们的身体既无言地隐匿在文本的叙事肌理内,又有声地展露在各自的生命体验中,这种矛盾统一的耦合关系最初体现在她们从小接受的身体规训中。失去双亲的摩尔被一位善良的老阿妈收养,在她的指导下学会了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凭借出色的女红,摩尔得到上流社会的眷顾并学习了各种文艺才能,“即使我生下来是和她们一样的贵妇人,所能受到的教育也不过如此”(笛福,1997:12-13)。无独有偶,作为伦敦外来户的罗克珊娜也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动人形象,她不但掌握了地道流利的英语,而且精通舞蹈和音乐,总之“我学会了英国青年妇女的一切习惯”(笛福,1984:3)。上述各种技能契合了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论述的“教养技艺”,它以令人愉悦的方式对个人进行诊断和可能的改造(福柯,2010:4-5)。需要指出的是,笛福对两位主人公的塑造也是其女性观的产物。他认为,风度娴雅的女性是“天地万物中最美丽多娇的东西”,除了外貌,女性还应该注重道德情操的培养,“如果没有淑静的举止,她的一切装饰和美丽都将是金玉其外”(笛福,1997:183-184)。反观小说,摩尔与罗克珊娜敞开身体的边界与社会伦理规范进行对接,针线手艺与文艺才能形塑出主流意识形态所嘉许的淑女形象,她们希望借助婚姻的加持跻身“贵妇人”(Gentlewoman)行列,以期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

但是,摩尔与罗克珊娜并未如愿成为18世纪英国社会所颂扬的贤妻良母。相反,她们

因爱生恨,最后无一例外地沦为了弃妇。在两位主人公的生活剧变中,读者再次瞥见了身体的能动作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身体与世界常常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我与世界共享肉身,世界会映照出身体,会侵蚀它,而它也会反过来侵蚀世界……身体与世界处于一种越界或重叠的关系中”(Merleau-Ponty, 1968:248)。身体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构性地存在于摩尔与罗克珊娜的婚恋经历中。摩尔认为其长相足以“摄人魂魄”,如果有人被她迷得神魂颠倒,“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笛福,1997:12-18)。然而,让摩尔始料未及的是,众人艳羡的美貌反而成为灾祸的始作俑者——一位经验老到的纨绔子弟因觊觎她的姿色而诱其失身,在一番玩弄之后又将她无情抛弃,“我一直以为,总有一天他会堂堂正正地成为我的丈夫,因而有过无限的向往;现在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笛福,1997:35)。如果说恋爱中的摩尔降格为男性欲望游戏的牺牲品,那么,初为人妻的罗克珊娜所遭遇的厄运则凸显了现行婚姻制度对女性的戕害。罗克珊娜的丈夫是伦敦小有名气的酿酒商,为了躲债他撇下妻儿不知所踪,罗克珊娜骤然陷入衣食无着的生存危机:“以前我长得又丰满又漂亮,现在瘦得像个恶鬼……我们几乎把什么都吃掉了,已一无所剩,除非像那些个可怜的耶路撒冷妇女一样,要吃我只好吃亲生孩子了。”(笛福,1984:15)饥饿侵蚀的身体作为情动(affect)的接收器,质变为影响罗克珊娜情感认知的主要因素,她痛彻心扉地意识到,“一个女人一旦结婚,她就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婚姻契约的实质就是要女人把自由、财产、权力等一切东西都交给男人”(笛福,1984:163)。至此,心灰意冷的摩尔和罗克珊娜被抛入了荒岛一样的生命境遇中。对于身无长物的她们来说,天赋的俊秀容貌或许是维系生活的唯一资本,她们被迫走上了一条出卖肉体的生存之路。

在摩尔和罗克珊娜看来,身体资本可以兑换成经济资本,二人对财富的热切追求流露出精心算计的商人本色,这从她们对服饰时尚的迷恋中便可见一斑。众所周知,时尚是指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服饰模式,它可以“反映某些关系的细微变化,如两性之间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相互竞争的或是上升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孔兹,2018:14)。在摩尔和罗克珊娜的生存体验中,不同的着装模式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展现了独特的身体美学,而且拓展了着装者的生存空间,服饰与身体之间形成了悖反性的戏剧张力。

一方面,服饰是身体视觉化展演的物质媒介。摩尔和罗克珊娜对服饰有着较高的审美趣味,她们对时尚的敏感很大程度上源自周围潜在的男性权贵。为此,摩尔总是费尽心机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笛福,1997:116),而罗克珊娜则自信地认为“我在伦敦会惹人注目的,何况我还会那样装扮自己”(笛福,1984:179)。她们的穿衣方式构成“阶层身份伪装”,即个体伪装成更高层级的社会身份以达到阶层流动的目的(张卫东,2017:93)。在服饰的包装下,摩尔和罗克珊娜获得崭新的身份标签,她们频繁地穿梭于伦敦的文艺沙龙和社交聚会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她们的穿衣哲学映照出这样一个认知逻辑:身体的

审美价值需要光鲜服饰的装扮才能保值甚至不断增值,对自身形象和身份信息的掌控是安身立命的关键手段,“所以个体可以对这一方面加以操控,从而获取更大的益处”(Goffman, 1959: 8)。此外,服饰也是主人公纾解身体焦虑的得力工具。罗克珊娜在跟德国亲王的交往中就对容颜衰老深为戒惧,“若是我的美貌衰退了的话,我相信他的情火就会减弱……到时候我就会像另外一些大人物的情妇那样,重新被人抛弃”,因此她下定决心“不让自己貌减色衰”(笛福,1984:115)。罗克珊娜的顾虑从反面表明,魅惑的身体将更具视觉快感,也更容易在充满功利色彩的婚姻市场渔利。从纯真到反叛,从边缘化的沉默天使到独立不羁的前卫女郎,摩尔和罗克珊娜在探索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认同方面达到了完美体征与自由精神的统一。

另一方面,服饰也造成了女性身体的物化。阶层身份伪装固然能让摩尔和罗克珊娜过上梦寐以求的优渥生活,但在男性凝视与豢养之下,她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陷入物化的怪圈。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细节是,她们身着的上好服饰大都是男性赠送的礼物。莫斯(Marcel Mauss)在阐述礼物的社会功能时指出,馈赠某物给他人是呈现自我的特殊方式,“在这种观念体系中,所要还给他人的东西,事实上是那个人本性或本质的一部分”(莫斯,2016:19)。接受者与赠送者借由礼物达成了“互相交换和互定契约”(莫斯,2016:9)的关系,也就是说,摩尔和罗克珊娜必须让渡自己的身体以回馈礼物的赠送者,她们“被纳入到一个循环之中,并且围绕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上规则地运动”(莫斯,2016:34)。由此不难理解,时髦的身体如同商品一样处于频繁的流动交换中,恰如摩尔所切身体会到的那样,漂亮的女性“像掉在大路上的一袋钱或一块宝石”(笛福,1997:116),成为男性竞相追逐的猎物。然而吊诡的是,身体的狂欢与自由的快感无法祛除她们意识深处影影绰绰的暗恐(the uncanny)——摩尔常因奢华的生活而自责,“即使是在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也摆脱不了这种良心的谴责”(笛福,1997:109),同样的生存方式也让罗克珊娜惶惶不可终日,她感觉一生的风流韵事“是对上帝的冒犯”(笛福,1984:141)。对自我的确证导致无家可归与主体性被褫夺的尴尬处境,如何兼顾现代女性的合法权益与传统性别伦理规约,是以摩尔和罗克珊娜为代表的英国底层女性面临的迫切现实问题。

笛福对18世纪初期英国女性的生存境况一直颇有微词:女性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但在婚内却无权继承丈夫的任何财产,一旦丈夫破产或早亡,她们就更加无依无靠,他建议政府创立寡妇互助会和女子学院,因为女性的福祉“将大大有利于国计民生”(笛福,1997:199)。在《摩尔·弗兰德斯》与《罗克珊娜》中,笛福挪用女性声音(female voice)展开叙事,这种被称作“叙事易装”(narrative transvestism)^①的话语策略旨在强化读者对女性生存体验

① “叙事易装”是指男性作家在小说中伪装成女性人物,且以女性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的写作技巧。卡恩认为,这种“叙事投射”不仅有助于传递作者的性别观念,也是作为新兴文类的小说建构人物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Kahn, 1991: 6)。

的参与感和对女性完整自我的投射性认同,进而激发读者对本应理想、安稳而又幸福的英国家庭生活展开想象(Kahn, 1991: 1)。毫无疑问,对于笛福而言,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代表着英国性的一个重要面相。两部女性小说中的身体话语表明,消解性别壁垒不仅关涉社会道德走向,也意味着责任与正义的召唤,而这恰恰是迈入现代性轨道的英国界定民族身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3 病态身体与民族共同体重构

相较于上述三部作品对个体具身性经验的细致再现,纪实小说《瘟疫年纪事》(以下简称《纪事》)关注的是瘟疫重创下不列颠民族的病态身体。《纪事》记述了发生于1665至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小说将疫病的发展变化、公共舆论的起伏纠缠以及人性的本真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里凯提(John Richetti)指出,叙事者H. F.的视角在惶恐与冷峻之间摆动,读者与叙事者一道在混乱、绝望与满足的情感波动中重构现实世界的意义(Richetti, 2008:134-135)。里氏对叙事者的身份危机进行了剖析,但忽略了其观察到的瘟疫背后的政治意涵。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在对城市病态身体的书写中,笛福对不列颠民族共同体展开想象,并由此建构了心目中理想的英国性。

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疾病不仅是生命的阴暗面,更是“一重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桑塔格,2003:5)。在《纪事》中,突如其来的瘟疫让整个伦敦陷入空前的混乱。在小说的扉页中,这起灾难事件被定性为“最引人瞩目的公众或私人事件”(笛福,2013:27)。换言之,瘟疫以身体为载体,消解了公私界限,联结了个体与族群。那么,笛福是如何再现伦敦市民的病态身体的呢?病体又如何催生了不列颠民族的共同体想象?

根据H. F.的记述,瘟疫给感染者带来了莫大的身体伤害,患者的脖颈和外阴会出现大量肿块并伴随高烧、呕吐、头痛等一系列症状,极度的身体疼痛会使其陷入谵妄发狂、精神错乱的反常状态,遍布街区的嚎叫声和咒骂声即是由此而发。好奇的H. F.每次在伦敦街头都会猝不及防地与瘟疫相遇,他以摄像机一般的客观视角记录下患者及其亲属的恐惧与癫疯:一位母亲因痛失爱女而歇斯底里,她“在屋里到处跑来跑去,上楼下楼,像一个发狂错乱的人”(笛福,2013:107);还有一位不堪病痛折磨的男子赤身裸体地从家里冲向死寂的大街,他“一边跑一边跳舞唱歌,还做出千百个滑稽动作,身后有五到六个女人和孩子追赶,哭着喊着让他务必回家去”(笛福,2013:267)。瘟疫受害者的视觉和听觉意象反复出现,形成恐怖的、非理性的循环(龙丹等,2020:42)。然而,传染病人的流动无形中加剧了疫情的扩散,他们的病体充当了“把瘟疫传染给别人的工具”(笛福,2013:127),生命的悬置状态昭示了身体救赎的紧迫性。为了有效阻断传染源,伦敦当局采取了大规模的禁闭措施,

对病态身体的即时管控构成了一种规训类型。福柯在研究中世纪欧洲对麻风病、鼠疫和天花的防治时指出,由于疫病对人口健康和数量造成严重威胁,疫区会实行“严格地划分格子,并且指示什么时候能出去,在家里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必须做些什么”(福柯,2010:7-8)的应对措施。因此,人口成为生命政治的客体,“规训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安全在整个人口上实施”(福柯,2010:9)。疫情之下的公民身体成为权力严苛监管的对象,理性指导下的疾病空间与健康空间的区隔有望降低死亡率,维持人口安全,让城市肌体尽快恢复正常。

尽管如此,伦敦还是有大量的死亡病例出现——空间禁闭让许多“活着的幽灵”(笛福,2013:149)铤而走险,他们不顾一切地逃离住所,由于缺衣少食而在街头或野地暴亡。H. F. 花费不少笔墨对尸体这一特殊的身体样态进行描写:大量尸体由于无法及时安葬而腐败,而那些被处理的遗体充其量也只是被草草地扔进郊外的壕沟。H. F. 在伦敦街头游走时偶遇一辆运尸车,“里面装了十六、七具尸体,有些裹着亚麻布寿衣,有些裹着毯子,有些则与赤身裸体无异,或者说是那样的松松垮垮,以至于从车上被抛出来时,他们披挂着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掉落下来”,这些死尸“胡乱堆在一起要被塞进人类的共同墓穴里”,因为被疾病吞噬的人“其数量之大,棺材是装不下的”(笛福,2013:116)。有学者指出,死亡意味着身体经受一种异化,“死亡瞬间就能把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孔变成一个陌生的客体”“遗体的在场会唤起某种幽灵一般的萦绕氛围”(尉光吉,2022:49)。小说中,瘟疫无异于一场生死炼狱,逝者的尊严被弃之一旁,甚至连生者也被剥夺了哀悼亲人的权利,“葬礼变得那么多之后,人们因此就没法敲钟、悲悼或哭泣”(笛福,2013:265-266)。这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创伤留下“一个将无法忍受的体验、记忆或秘密围阻起来的心理空间”(施瓦布,2011:191),在这个密穴一般的心理空间内,逝去的亲人成为难以言说的禁忌,幸存者时刻徘徊在充斥着无力、内疚或耻辱的情感迷思中。与此同时,个体的心理创伤外化为哥特式空间表征,叙事者哀叹“城市本身的面目叫人害怕”(笛福,2013:267),代表大英帝国威仪的伦敦“整个儿浸泡在泪水里”“连世上最刚强的人听着也会为之心碎”(笛福,2013:51)。瘟疫不仅给市民留下深远的创伤记忆,也在城市的集体记忆中刻下累累伤痕,“瘟疫造成的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及自由危机将沉淀至其情感结构”(龙丹等,2020:44-45)。

那么,瘟疫塑造的情感结构究竟有何指涉呢?细绎文本可以发现,它以身体为根基,涉及政治和经济双重维度下的不列颠民族共同体想象。一方面,小说以瘟疫作为修辞策略,建构了一种国家身体观。当荷兰货物携带的病毒入侵英国时,如何既能保护公民身体健康,又能维系不列颠民族的纯洁性和统一性,便成为小说的焦点议题。换言之,瘟疫过高的死亡率引发了强烈的国族焦虑,有效抵御疾病的侵袭不仅事关公民身体,而且会影响王权、政府乃至整个民族的和谐健康(Totaro, 1999: 1-2)。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小说将瘟疫视作

亟待化解的公共危险,并明确指出其不仅针对首都伦敦,“而且还针对整个民族”(笛福,2013:124)。瘟疫将不列颠民族共同体抛向了瓦解的边缘,如果听之任之,“它就要散布在这整个城市,甚至散布在这王国的不毛之地;而且几乎要毁掉这整个国家”(笛福,2013:63)。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保护国王陛下的臣民免于这场传染病”(笛福,2013:94),诚如有评论所分析的那样,国家应全力促进公共卫生,保持民众健康,“人体本身和国家的政治是密切相关的”(邹翔,2015:98-99)。

另一方面,小说借由人口健康—财富观来呈现民族共同体想象。人口健康与国家财富是18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极为重视的问题,“他们将人口看成国王这一大家长的财产,将人口与国家的富强联系起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口的健康,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富强离不开民众的健康”(邹翔,2015:98)。实际上,力倡经济个人主义和对外贸易的笛福便是重商主义的拥趸。在他看来,人口是不可多得的国家资源,公民的健康(health)无疑将有助于国家财富(wealth)的积累,他特意选择鞍具商人H. F.作为叙事者即是明证。只不过,小说呈现的是这幅理想愿景的反面走势。瘟疫的肆虐阻断了英国贸易的良性增长,正如感染者体内的血液一旦堵塞便会危及生命。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就生动地描述了血液循环与商品流通之间的隐喻性关联:“它(商品)在国内人民之间周流传用,并在传渡过程中营养各部分。其情况很像国家的血液流通:因为天然的血液也同样是由土地的产物构成,而且在流通过程中一路营养人体的各部分。”(霍布斯,2017:196)在笛福的重商主义思想中,上述关联被置换成血液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交互关系。他认为,英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强大的贸易基因,“只有贸易的血液与(英格兰)勇敢的血液合而为一,贸易才能成为国家的生命……和财富的源泉”,一旦贸易萎缩,国家身体“便会染病消沉”(Nixon, 2014: 70)。笛福借H. F.之口忧心如焚地谈到欧陆诸国“全都对我们感到害怕”,法国、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干脆拒绝英国船只进港交易,“我们生产的制造品和货物在国外不会被人触碰,他们跟害怕我们的人一样害怕我们的东西”(笛福,2013:324-330)。瘟疫不但让英国海外贸易蒙受损失,更影响了国家的对外形象,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救赎迫在眉睫。

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指出,共同体可以视作一个社会性身体,亲属、邻里及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了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而且会影响到所有成员的福祉(Tönnies, 2001: 43)。因此,围绕民族共同体的复原与重建,伦敦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共情意识与身份认同。比如,国王将私人财产转交给参议院,用来救济穷人;市长和参议员制定了良好的管制政策,“伦敦可以成为全世界所有城市的模范”(笛福,2013:245);内科医生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城市变得健康起来”(笛福,2013:35)。此外,警察、治安官、检查员、清洁工等基层人员也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柔情、怜悯和责任”(笛

福,2013:190)。这股向心性的情谊和力量使人心不再惶恐,城市肌体开始康复。瘟疫虽然对民族生存造成威胁,但也让同者与他者建立了更紧密的情感纽带,悖论性地促成了现代不列颠民族共同体的重生。可以说,瘟疫裹挟下的身体话语“无声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创造出人们对……共同体不同寻常的信心,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显而易见的特征”(Anderson, 2006: 36)。

4 结语

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找到一种表达其信仰的语言,而身体恰好是不可多得的“象征语言”(奥尼尔,1999:61)。笛福意识到,身体是英国公共事务和文化实践的作用对象,它的各种样态微妙地折射出一个民族的鲜明性格(Flynn, 1990: 217)。如果说在18世纪的欧洲,小说构成一种想象的“基本结构”,它“为‘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形式”(Anderson, 2006: 24-25),那么在笛福的小说中,身体被改造成蕴含多重文化信息的话语场,作者将种族、性别、民族等质素恰如其分地纳入身体叙事,对帝国殖民者、底层女性与伦敦市民的具身性体验进行厚描,实现了对英国性的重新界定,即真正的英国精神孕育自每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它是一种界定自我和民族身份,进而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意识形态。笛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隐含了他对大英帝国现代性进程的忧思与希冀,既有力呼应了18世纪初期民族国家崛起的大潮,又深刻影响了后世小说家的身体书写与国族想象。

参考文献:

- Agamben, Giorgio. 1995.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M].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P.
-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Armstrong, Dianne. 1992. The Myth of Cronus: Cannibal and Sign in *Robinson Crusoe*[J].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3): 207-220.
- Backscheider, Paula. 1976. Defoe's Women: Snares and Prey[J]. *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5): 103-120.
- Berman, Marshall. 1988.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M]. London: Penguin Books.
- Colley, Linda. 1992.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M]. New Haven: Yale UP.
- Dodd, Phillip. 2014. Englishness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G]//Robert Colls and Philip Dodd. *Englishness: Politics and Culture 1880-1920*. London: Bloomsbury.
- Flynn, Carol Houlihan. 1990. *The Body in Swift and Defoe*[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 Kahn, Madeleine. 1991. *Narrative Transvestism*[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 Kumar, Krishan. 2003. *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McDowell, Paula. 2006. Defoe and the Contagion of the Oral: Modeling Media Shift in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J]. *PMLA* (1): 87-106.
-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8.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M]. Trans. Alphonso Ling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 Nixon, Kari. 2014. Keep Bleeding: Hemorrhagic Sores, Trade, and the Necessity of Leaky Boundaries in Defoe's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J].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2): 62-81.

- Richetti, John. 2008. Defoe as Narrative Innovator[G]//John Richetti.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Said, Edward.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Vintage.
- Tönnies, Ferdinand. 2001.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M]. Trans.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 Hol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Totaro, Rebecca. 1999. English Plague and New World Promise[J]. *Utopian Studies* (1): 1-12.
- Wagner, Martin. 2017. Defoe, Foucaul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lague[J]. *SEL* (3): 501-519.
- Weber, Max. 2005.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 Trans. Talcott Pars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ood, Dustin Frazier. 2020. *Anglo-Saxonism and the Idea of English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M].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 戴维·孔兹. 2018. 时尚与恋物主义[M]. 珍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丹尼尔·笛福. 1997. 笛福文选[M]. 徐式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丹尼尔·笛福. 2003. 鲁滨孙漂流记[M]. 徐霞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丹尼尔·笛福. 1984. 罗克珊娜[M]. 天一,等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
- 丹尼尔·笛福. 1997. 摩尔·弗兰德斯[M]. 郭建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丹尼尔·笛福. 2013. 瘟疫年纪事[M]. 许志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郭建中. 2013. 郭建中讲笛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黄梅. 2015. 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加布丽埃·施瓦布. 2011. 文学、权力与主体[M]. 陶家俊,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维屏. 2008. 英国小说人物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龙丹,杨莉鸽. 2020. 《瘟疫年纪事》中的创伤叙事与中产阶级情感结构[J]. 外国语文(5): 40-47.
- 马塞尔·莫斯. 2016. 礼物[M]. 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米歇尔·福柯. 2010.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让-马克·阿尔贝. 2012. 权力的餐桌[M]. 刘可有,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苏珊·桑塔格. 2003.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陶家俊. 2008. 思想认同的焦虑[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托马斯·霍布斯. 2017. 利维坦[M]. 黎思复,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尉光吉. 2022. 梦、遗体、肖像:布朗肖的图像理论[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0): 45-54.
- 约翰·奥尼尔. 1999. 身体形态[M]. 张旭春,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 张卫东. 2017. 身份伪装叙事[J]. 外国文学(4): 86-95.
- 邹翔. 2015. 鼠疫与伦敦城市公共卫生:1518—1677[M]. 北京:人民出版社.

The Body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ness in Defoe's Novels

CHEN Xu KONG Lingran

Abstract: Body is a recurrent and remarkable image in Defoe's novels.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dy constitutes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corporating such elements as race, gender, and nation. The body narrative in his novels not only reveal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but serves as a poetic means to construct Englishness. Through body narrative, Defoe creates the image pedigree of British modern citizens which includes the imperial colonizer who survives physical hunger with diligence and self-discipline, the lower-class women who suffer so much and prostitute themselves for a livelihood, and the London citizens who rebuild their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wake of the devastating pandemic. The body narrative resonates with Defoe's rethinking of Englishness, effectively echoing the rise of modern nation-state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while profoundly shaping the body writing and the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of the later novelists.

Key words: Daniel Defoe; body; identity; Englishness

责任编辑:冯革